

一、历经变迁 几多沧桑

广济寺始建于金代，因寺址位于金中都北郊的西刘村，故名西刘村寺。元末战乱，西刘村寺为兵燹所毁，殿宇无存。明代有农人耕地掘出佛像、石龟、石柱等，知是古刹遗址，山西僧人普慧喜云募缘重建，成化二十年建成，赐额弘慈广济寺。清代改为律宗寺院，开坛传戒，得到清朝皇室的护持，寺院屡蒙修葺，香火久盛不衰。民国时期为京城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，并创办学校，致力于僧伽教育和平民教育。1932年发生毁灭性大火，多数殿宇焚毁，1935年重建，基本保持寺庙原有的建筑格局。建国以后政府多次拨款维修寺院。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，将会址设在广济寺。“文革”时期寺院曾遭到破坏，1972年经周总理批示而得修缮。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佛教寺院。1984年被确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。世纪之交，又得到全面修葺。

（一）金代草创 西刘村寺

广济寺始建于金代。据《宸垣识略》记载，

广济寺‘旧为西刘村寺,金时刘望云所建’。《弘慈广济寺新志》亦称该寺“古名西刘村寺,不以广济称”,系因寺址所在,原属金中都通玄门外北郊,当时北郊“有两刘家村,在西者为西刘村”。村里有位名叫刘望云的人“自谓天台刘真人裔孙,得练气之法”。一日,有位‘僧号且住’的和尚经过村庄,一见刘望云便道:“认得老僧么?”说完掉头便走。刘望云顿时心领神会,上前“执其手曰:且为我说法去”,恳请且住和尚留下讲经说法。不久,刘望云出资“为之建寺,曰西刘村寺”。^①这就是迄今为止有关西刘村寺的最为详尽的文字记载。

虽说在京城郊外建一座民间寺庙原本不足为奇,然而,处于金代对佛教严格控制的大环境中,一座乡间小庙能在夹缝中求生存,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,它有赖于燕地佛教源远流长的历史背景。

佛教传入燕地,大约是在公元 4 世纪初期至中叶。燕地普遍建寺则始于唐代,唐代帝王多尊崇佛教,到了唐中期,国力强盛,佛教发展亦趋于极盛。寺庙的兴建,已从州郡向所属县镇扩展。仅唐朝一代所建寺庙,即多达六十余所。

^①《弘慈广济寺新志》,释湛佑撰,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中卷,第 1 页。

辽代诸帝亦尊崇佛教，但辽代初期，由于契丹族统治者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关外，故而寺庙多建于上京（今内蒙昭乌达盟）和东京（今辽宁辽阳）等处。至辽代中期，随着辽统治者活动中心的转移，不仅都城南京（今北京）城内寺庙众多，远近郊区也是名刹遍布。如著名的永安寺（今白塔寺）即是辽代所建，据《日下旧闻考》、《长安客话》等文献记载，辽道宗寿昌二年（1096年），为藏释迦牟尼佛舍利，曾在辽都城外的北郊修建此寺和塔，后毁于兵火。元世祖至元年间，发现了埋藏于地下的舍利戒珠二十粒、香泥小塔二千及陀罗尼经五部，才在至元八年建成一座新的大寿圣万安寺和白塔。此外，阳台山清水院（今著名的西山大觉寺），也为辽代所建。当年西山脚下南安巢村的大地主邓从贵出资八十万兴建了这座寺院^①。由此开创了燕地民间出资建寺的风习。

金代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，对佛教大体采取严格控制政策。金代前期，诸帝不仅无暇崇奉佛教，而且对于佛教势力的影响，也多采取排斥态度。如天会元年（1123年），上京（今黑龙江省阿城南）庆元寺僧人曾进献佛骨，试图以此取得太宗的宠信，却遭到拒绝。太宗曾在天会八年

^① 《北京通史·辽代卷》，王玲著，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0年，第 291 页。

(1130年)下令,“禁私度僧尼^①”。海陵王时,张浩、张暉等大臣曾因尊敬僧人法宝,被斥为“失大臣礼”而各杖二十,僧人法宝则被扣上“妄自尊大”的罪名而杖责二百^②。正隆元年(1156)海陵王又下令禁止二月八日的群众性佛教活动,直到金世宗完颜雍上台才取消这一禁令。

金代中期,世宗、章宗等帝对佛教仍持排斥态度。金世宗曾对臣下宣称“至于佛法,尤所未信。梁武帝为同泰寺奴,辽道宗以民户赐寺僧,复加以三公之官,其惑深矣”,^③可谓直揭前代帝王佞佛之妄,并曾下令禁止民间建寺。金章宗即位后,一方面禁止私自剃度为僧,禁止僧尼等结交亲王贵族和三品以上高官;另一方面推出三年一度的僧尼考试制度,以严加限制佛教势力的扩张。金代中都地区的佛教,正是在女真统治者的严密控制下,以及在辽代燕地佛教广为盛行的基础上而有所发展的。

金代民间建寺最兴盛时期,为世宗大定年间。当时不仅在中都城里有士庶、僧人或官员所建寺院,在郊区及下属州县也建有不少民间寺院。据

①②③ 姜立勋、富丽等著:《北京的宗教》,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年,第

金朝政府新立的法令，凡民间自建寺院，“计立屋楹数若干，以为院，若干以为寺。□等第输强，以给新额，用正其名。”^①按上述规定，民间建寺可分为院与寺两级。建寺须视规模大小而向官府交纳相应的钱款，才算合法。

由此推断，刘望云所建之西刘村寺，可能产生于金世宗大定年间。虽然只是拥有数间房舍的乡村寺庙，但在当时建造这样一座民庙也绝非易事，除了要置地、募工、备料之外，还要上缴足额钱款方可获官方批准，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是无法办到的。可见，刘望云其人应非等闲之辈，他不仅有着“天台刘真人后裔”的家世传统，还应是富甲一方的乡绅财主。金代刘望云草创之西刘村寺，数百年后竟发展成为京城腹地举足轻重的佛教名刹，这恐怕是刘望云当年所始料不及的。

（二）元末战乱 寺宇无存

继辽金之后，元朝成为又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。在元世祖忽必烈定鼎大都之前，蒙古帝国的统治中心为漠北草原上的和林（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）。自太宗至定宗三帝，或尊奉萨满

^①姜立勋、富丽等著：《北京的宗教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 年，第 82 页。

教，或信仰景教、伊斯兰教，而对汉地佛教不甚重视。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，定鼎于燕，新建大都城，使燕地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。元代诸帝自忽必烈始，至元末顺帝，皆对佛教大力扶持，优礼有加。元代大都地区，不仅封建帝王出资广建巨刹，而且蒙古贵族、大官僚、大富商乃至中下层民众，也都纷纷出钱，在大都新旧两城不断兴建新寺、修复旧寺。此外，对于大都地区的著名寺院，元朝政府还赐给大量钱财、土地和其他产业予以资助，这与金代上缴钱款方可建寺的旧规形成鲜明对照。据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）的官方统计，在大都地区，仅元朝历代帝王所建的大刹就有十二所，僧人三千一百五十多^①；其他官、私、僧众所建大小佛寺，又有数百所之多，星罗棋布于都城内外，僧众之多，更是不可胜数。显然，元代的大都已经成为全国佛教活动的主要中心。

元大都不仅版图超出金中都范围，且位置整体北移。原属金中都北郊的西刘村，此时业已划入元大都城西南部，以村冠名的西刘村寺，一举成为都市民众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。西刘村寺会不会由于行政区划的变迁而更改了寺名？有不少人这样推测。如：田奇编著的《北京的佛教寺庙·

^①姜立勋、富丽等著《北京的宗教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 年，第 99-100 页。

广济寺》称该寺“元代改称报恩洪济寺^①”。遗憾的是，该书并未援引任何史料支持自己的说法。而在《弘慈广济寺志》中，却找不到任何关于寺庙元代更名的记载。据查考，在历史上，燕地确曾有一所名为“报恩洪济”的寺院。至于这座寺院是否系由西刘村寺更名而来，我们不妨对有关文献作一些分析。

《中国佛教》一书的“元代佛教”一章中，记有万松行秀（金、元时禅宗名僧）曾住于“燕京报恩（洪济）寺内从容庵^②”。姜立勋等编著的《北京的宗教》也记载，万松行秀在金末元初“蒙古军攻占中都后，隐居于燕京报恩（洪济）寺之从容庵^③”。从上面两处记载可知“报恩洪济”确曾存在。此外，《弘慈广济寺志》中有一段更为详尽的记载，亦有助于对该寺存在年代进行推测。

万松老人名行秀，河内人。游燕历潭柘（寺）、庆寿（寺）各刹，亦曾挂褡西刘村寺，……住中都万寿（寺），金章宗请入内廷说法，

① 田奇编著：《北京的佛教寺庙》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，第 134 页。

② 《北京的佛教》，第一辑中国佛协会编，东方出版中心 1980 年，第 106 页。

③ 姜立勋、富丽等著：《北京的宗教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 年，第 90 页。

……复诏师（行秀）住大都仰山（寺），次移报恩洪济（寺）。元太祖庚寅，复奉敕主万寿（寺）。晚年退居从容庵。……元定宗元年丙午，四月四日示疾，七日书偈而逝……。建塔于西刘村寺前，今甘石桥北砖塔是也^①。

这是寺志中唯一提到‘报恩洪济(寺)’全称的一处记载。从这段文字中可以得到两个印象：

一是西刘村寺到元定宗（1246—1248）时尚未更名；二是万松行秀从仰山寺迁移至报恩洪济寺，是在元太祖（1206—1227）朝甚至更早，当时尚处于金代（1115—1234）末年，距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为元（1271年）并定鼎于大都（1272年），时间上相隔半个多世纪。显然，报恩洪济寺在金代即已存在，它曾与西刘村寺并存过一段时期。因此，说西刘村寺“元代改称报恩洪济寺”，似乎是难以成立的。

元代末年，朱元璋起兵凤阳，平定割据群雄，北伐大都，元亡明兴。战争动乱当中，这所历经金、元两代的西刘村寺亦难逃劫难，“为兵火焚

^① 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·尊宿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下卷，第3页。

毁，荡然无遗^①”。

（三）明代重建 敕赐寺额

明初太祖朱元璋定鼎于南京，该地佛教曾兴盛一时；而大都则被降为北平府，致使燕地佛教一度中衰。至燕王朱棣“靖难”功成，方将都城迁回北京，此后直至明亡未再变更。北京遂复成为全国的政治、文化中心。

明代北京的佛教，由于封建帝王、皇亲国戚、太监、官僚，以及广大民众的崇奉，发展臻于极盛，寺院建造之多，远超前代。明代诸帝，除世宗外，皆崇奉佛教。至英宗时，始广建佛寺，滥赐寺额。至代宗、宪宗时，已是梵刹遍地，僧尼无数。到武宗时，崇佛更甚，武宗自号“大庆法王”，并在皇宫里面创建寺宇，以供广行佛事。此外，明代诸帝还热衷于在即位时，度僧一人，名曰“代替出家”。此风习愈演愈烈，到神宗万历年间，不仅帝王即位要度僧为替身，而且皇室的太子及诸王出生时“俱剃度童幼替身出家^②”。由此可见明代皇族崇佛之笃。导致明代佛教趋于极盛，

①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中卷，第1页。

② 姜立勋、富丽等著：《北京的宗教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、第101页。

除诸帝崇佛外，另一个重要原因，则是历朝太监崇佛，出资广建佛寺，竟比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时人讥之，“都城自辽、金以后，至于元，靡岁不建佛寺，明则大珰无人不建佛寺。梵宫之盛，倍于建章万户千门^①”。大珰即指有权势的大宦官，自明成祖朱棣任用宦官，大珰权势日盛，如王振、魏忠贤之流，权倾朝野，他们平日无恶不作，却又笃信佛教，倾其资财，用其权势，广建佛寺，企图多积“功德”，以求死后升于极乐世界。

都城内外，除了帝王、太监们所建的梵宫巨刹外，也有不少由僧侣提议，士庶出资所建的寺院，最著名于当时的便是弘慈广济寺。广济寺的兴建，缘于西刘村寺遗物的发掘出土。

据史料记载，明景泰年间，有耕地者在原西刘村寺旧址，“掘得佛像、石龟、石柱于土中”，这一发掘引起时人怀古之幽思，“山西僧普慧、圆洪辈募缘兴复”^②。普慧，号喜云，为潞州（今山西长治）僧人，于明天顺元年（1457）带领僧徒圆洪等人来至京师，发愿在西刘村寺遗址上复兴废刹。太监廖平、曹整、卢仪、王景、王郊等得

① 姜立勋、富丽等著：《北京的宗教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 年、第 102 页。

② 释湛佑撰：《张慈广济寺新志·建置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上卷，第 1 页。

知有高僧意欲在此造寺，正遂心愿，乃大力资助。

明代僧人自筹资金兴建寺庙，在当时不乏其例，但因财力、物力所限，通常寺庙规模狭小。如万历年间建于彰义门外的宝应寺便是如此。据该寺碑刻记载，僧人静春、真万、如莲等带领众僧“禅颂余闲，躬耕寺侧，岁收其入，铢累而藏之，积十余年，共得如千金，鸠工庀材，颓构聿新”^①。积十余年所得，才能修葺一间旧寺，其艰辛之状，不言自明。故而，一般僧人建寺，大多仰仗太监、官僚及皇亲国戚等权势之赞助。普慧等僧人便在尚衣监廖平等热衷建寺的太监们支持下，于成化二年（1466 年）建寺工程正式动工。一年后，首先建造了山门，门内左右建有钟鼓二楼。第一进院内建有天王殿，殿中塑四大天王像。继而陆续建造了伽蓝殿、祖师殿、大雄宝殿、大士殿等宏阔殿宇，殿中所塑佛像，包括释迦佛、药师佛、弥勒佛、观音、文殊、普贤等，以及十八罗汉、达摩、百丈、临济等禅师，诸像“皆饰以金”；主要殿宇之外的其他建筑，如斋堂、禅堂、方丈室、僧舍等以及幡幢、供器等物品，凡“寺之所宜有者，无不毕具”^②。

①姜立勋、富丽等著：《北京的宗教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 年，第 105 页。

②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上卷，第 10 页。

浩大的建寺工程“始于成化丙戌（1466）之春，落成于甲辰（1484）之夏^①”，前后历时近二十年方告完成，其建筑规模之宏大可想而知。寺建成后，太监廖平为普慧师徒具牒上闻，宪宗皇帝乃“赐额曰：敕赐弘慈广济寺^②”，又授圆洪为“僧录司右觉义，寻升右阐教僧，住持于内^③”。广济寺从此成为京城一大名刹，寺名再未更改过。普慧作为弘慈广济寺的“开山祖”，以戒行精严著称，颇受同道钦仰，涅槃后造塔于玉泉山二圣庵侧。成化六年，宪宗皇帝还特遣礼部郎中至广济寺祭奠普慧，称赞他“早通释典，克持戒律^④”，并树碑于塔院，以供后人瞻仰。

自广济寺建成至明万历年间，已历有百年，以至佛像斑剥，殿宇倾颓。时有中军都督府彭城伯张守忠和后军都督府惠安伯张元善，“因感前人之创建，而弗能保将来之废毁”，故“与同志者捐金义会，积少成多，遂于甲申岁孟夏吉日鳩工修葺，易朽成坚^⑤”，万历十二年六月工竣，乃作“重修广济寺碑记”，勒石于寺中。

①②③ 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上卷，第13页、第1页、第10页。

④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中卷第2页。

⑤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·建置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上卷第

(四) 清代鼎盛 名冠京华

清初，恒明和尚住持广济寺。顺治五年（1648），延请玉光律师升座说戒，“一岁三期，共十三载，出其门者数千人^①”；广济寺自是成为京城著名的律宗道场（律宗，佛教的教派名称，唐代释道宣所创，强调戒律是佛教之根本，解脱之要道）。清世祖顺治闻之，于顺治十三年亲临广济寺礼佛进香，并颁赐渗金释迦文佛像一尊。此后，信佛甚笃的清世祖从广济高僧“结制二期，说戒一期，龙车数过，恩礼特隆^②”；举凡济贫、作诸佛事所降圣旨皆由广济寺监院德光拜受。为此，德光常常“进椒园启奏，语大臣曰：广济德光奏事。上即传入便殿，奏讫即出，一日数次。上不为厌”。不仅如此，皇上还顾念德光“奔走劳顿，亲出名马赐之^③”。广济寺在京城名声日益显赫。

恒明和尚自主广济寺以来，素有一桩心愿，要为广济寺请来全套的大藏经，以便更好地弘扬佛法。顺治十三至十六年，恒明大师离京南下，

①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·传记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中卷，第13页。

②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·传记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中卷，第20页。

③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·传记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中卷，第21页。

“过金陵印藏经五千四十八卷^①”。大藏经为佛教经典总集，早年曾有南藏和北藏两套大藏经版。北藏经版贮于大内，散遗甚多；贮藏在南京大报恩寺的明刻南藏经版也已残缺过半。据周天成《金陵印藏序》记载：当地有位松影和尚慨然以补造南藏经版为己任。时值周天成主江宁织造公署，愿捐己俸以助其成。正当募工雕造之时，忽有都门广济寺住持恒明，持京中显宦书信与捐资至南京，恳请周主持雕印南刻大藏经。顺治十六年金陵印藏工成。恒明和尚终尝所愿，满载而归。

康熙二年，恒明和尚又在广济寺后兴建大藏经阁以贮远道请来的南刻大藏经。不料，当时“东华门大街有僧盖阁为游览地”被视之为“妖”而押至刑曹，该僧无言以对，乃“引广济盖藏经阁事，欲将此以方彼也”，官衙遂遣人至寺中质问“欲与东华门僧一等议罪”。紧急关头，德光监院据理力争，称“本寺后原有藏经阁旧基”，并非侵占官街，且建阁之事“世祖皇帝皆闻之，非私意也^②”。藏经阁这才得以兴建。阁建成后，康熙皇帝曾亲临广济寺藏经阁参观并御览大藏经。

①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·传记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中卷，第8页。

②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·传记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中卷，第21页。

康熙十六年德光示寂，塔葬于玉泉山二圣庵。正如沙门史氏评曰：监院亦难乎其为人矣！有道之衲持诵焚香不知世事者良不少也，然一遇事变之来，能劈理分肌如德光师者鲜矣^①！

据寺志记载，康熙“十八年京师地震”，广济寺“所在院宇倾圮，恒老人（恒明）旧建俱毁”。其时德光监院已经圆寂，众僧推举复初和尚任广济寺监院。震后的广济寺，“前后梵殿瓦缝悉裂，画壁崇垣剥落无剩”，复初监院痛心疾首，乃“昼夜修行”，感化信众，广募善缘。时有“镇国将军法名如髻”被“师（复初）之硕德”感动，“发心重整”震毁之寺。复初监院以所募善款“鸠工庀材”，带领僧俗四众“奔走效劳，以成厥事”，终于将寺院“修盖如故^②”。康熙皇帝亲临震后重建的广济寺；驻蹕山门，游幸大殿，深嘉法地精严有霁色^③”。

时隔不久，广济寺中又兴建一座大悲坛。清翰林院侍读学士沈荃《大悲坛记》记载，早在康熙十六年，临济宗三十三世传人天孚和尚鹤林得法，回归广济寺。其时“滇南多事，禁旅遄征，

①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·传记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 中卷，第 22 页。

②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·传记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中卷，第 28 页。

③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·传记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中卷，第 29 页。

干羽临阶，有苗未格”，天孚和尚于是“发愿建大悲坛”，以阐扬佛教，祝赞皇图。有居士蔡永茂、邓光乾“闻而善之”，愿为建坛捐资鸠材。“辛酉（康熙二十年）冬，大悲坛落成^①”，康熙皇帝“驾幸”坛中，礼拜施檀佛像。据寺志所载，天孚和尚名湛佑，字天孚，十三岁入广济寺落发，师从恒明尊宿。天孚恪遵师训，受具戒后，禁足书《华严经》。久之忽有省发，遂南游江浙，遍参诸方。后得法于鹤林寺天树植和尚。于康熙十六年回归广济寺，在寺后别筑一室韬晦自养，时人称之为“别室天孚和尚”。

别室前曾植有一株仙枣树，即誉为广济八景中的“仙枣垂瓔”，传说该树是西刘村寺的遗物，为刘望云当年亲手所植。由于年久树坏，又在原处补植一株，无人确知其名。此树季春开花，花色紫而蓝，寺僧不识其名，姑且称之为桐树。康熙三十三年，皇帝“车驾临幸，坐别室中”，见此树奇异，遂问其名，天孚和尚答曰：“人谓之桐树”。皇上则说：“桐树故多种，此甚不类……，存之，以待识者，勿强名”。随后又详细询问该树是否有花、何时开放、花色如何等等，天孚和尚一一作答。皇上甚感兴趣，要求“花时奏知”。

^①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·传记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中卷，第30页。

第二年季春花放，天孚和尚进宫奏报，康熙皇帝兴致勃勃，再度“临幸，坐花下”，问随行侍臣是否识得此树。众人面面相觑，皆说不知。康熙遂道：“此树皮质柔软，细蔓不旁引，枝枝上耸，盖异树也”。天孚和尚见皇上如此欣赏该树，表示愿将其与寺内圃中另一株同类树一并进奉。皇上爱惜此树，示意“此树勿动，圃中可也”。当年中元盂兰盆会，康熙皇帝特赐广济寺“御书药师经十卷，十八罗汉赞十首，临米带观音赞一首^①”，天孚和尚则将圃中那株无人能名之异树进奉宫中，植于畅春园。康熙皇帝甚悦，御制广济寺碑文以赐，并亲书寺额悬之山门。广济寺由于不断得到皇室垂顾，声望日重。

康熙三十六年，天孚和尚在广济寺主持建造了戒坛。戒坛是佛教传戒和受戒之场所。我国自晋、宋以来，佛教传戒时都建有戒坛。根据律宗三派之一南山宗的创始人唐代道宣《关于戒坛图经》的记载，到唐初为止，自渝州（今重庆）以下至江淮（江苏、安徽）之间，共建有戒坛三百余所。这些戒坛形制如何已不可考。到了唐乾封二年（667年），道宣在长沙净业寺建立戒坛，才开始具有一定规制。戒坛应为三层，下层纵广二

^① 释湛佑撰：《弘慈广济寺新志·传记》，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 中卷，第 32 页。